

日本中世建筑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以寺院建筑为主 上野胜久

日本建筑史的中世以从中国宋朝传来新的建筑样式作为开端（东大寺南大门、钟楼），而以出现日本本土的建筑新样式和新技术作为结束（姬路城天守阁、如庵茶室）。中世寺院建筑史研究涉及平面和空间形式的演进，建筑样式的传播与发展，施工方法和技法的变迁，建筑样式与匠作体系的关联，佛教仪式及信仰与空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本文主要总结了平面、空间、样式、结构等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探索该领域今后的研究课题及方向。

日本中世建筑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 ——以寺院建筑为主

上野胜久 著，包慕萍 唐聪 译

1 中世的时代区分

概观日本建筑史，一般认为中世从东大寺和兴福寺的镰仓复兴开始，近世则以天守阁和茶室的发展成型作为标志。“古代”和中世以从中国大陆再度传来新的建筑样式为分界点，新样式的实例有东大寺的南大门、钟楼（图 1）等。中世和近世之间则以建筑新样式和新技术的出现作为断代要素，如姬路城天守阁（图 2）和如庵茶室。本来建筑史的断代区分不一定与政治、社会史的断代相同，但是从结果来看，大致可以认为中世从镰仓时代开始、近世从桃山时代开始。



图 1 东大寺钟楼 1207—1210 年(承元年间)



图2 姬路城天守阁 1608年(庆长13年)

由于中世的寺院建筑有很多实例现存于全国各地，相关史料也很丰富，故而中世的寺院建筑的研究方法与古代寺院建筑的研究方法很不相同。其研究主题也涵盖了平面和空间形式的演进，建筑样式的传播与发展，施工方法及技法的变迁，建筑样式与匠作体系的关联，佛教仪式及信仰与空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近世寺院建筑的研究在近几十年中有了显著的进展。若考察一下出现于中世末期到近世初期的木割书（集设计技术之大成的建筑技术书），就会发现虽然由于流派和体系不同而各有独特之处，但是书中大都已经对和样、大佛样、禅宗样这三大样式进行了区分，与现在的建筑史上的分类方式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在木割书成书的阶段——即到16世纪为止，木匠或者技术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各个样式之间的差异，并且开始将各种建筑的形式体系化。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可以说中世时期建筑在样式、空间和结构上已经有了体系化和特性化的倾向，现在的研究正处于尝试解析这一形成过程的阶段。

2 平面和空间的演变

虽然就建筑样式而言，兴福寺建筑群对传统和样的复兴以及东大寺建筑群对崭新的大佛样的应用带来了中世的开端，这些建筑群的平面和空间却基本上延续了古代的方式。不过，相对于空间形式单一的土石地面，土间式的古代佛堂，中世的佛堂多铺设地板（床式），使室内地面出现高差，空间复层化，这一点与以往非常不同。古代佛堂的平面和空间形式在向中世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地发生变化，而且是多样化和统一化两方面的变化同时发生。虽然与此相关的研究早已展开，但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到了探求变迁的具体过程的阶段。

奈良县的当麻寺本堂（曼荼罗堂）的平面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外阵，后面是内阵。这处佛堂的空间构成追随着信仰变迁的脚步经历了几次不断深化的阶段，现在看到的形式确立于1161年（永曆2年）（图3）。它是古代单一性佛堂空间开始向“内阵+外阵”的空间形式发展的先驱性实例。滋贺县的西明寺本堂则是镰仓前期的五间堂在室町前期（南北朝时代）

扩大为七间堂的实例。



图3 当麻寺本堂(曼荼罗堂)1161年(永历2年)

观心寺金堂（图4）是14世纪中期的建筑，它的内阵和外阵连续为一体，形成纵深空间布局，这一点与当麻寺本堂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其内部空间供奉的是体现真言密宗特征的两界曼荼罗。从高野山金堂久安6年（1150）重建时的“指图”史料（平面图）可以得知，这种空间构成在平安末期已经确立。



图 4 观心寺金堂 14 世纪中期

古代的佛堂通过修理，到中世仍然得以延续使用。称为五间堂或者七间堂的中世本堂一般都是从古代的三间四面堂或五间四面堂演化而来，而且，平安时代后期的本堂已经出现了“内阵+外阵”的空间形式的萌芽。而正是在中世，匠人们运用高超的技术和手法，采用多种多样的建筑样式，赋予建筑空间以独特的个性。

3 样式的转变：和样与大佛样

建筑样式的发展是建筑史学最为关心的部分，因此也最先得到研究。和样是以从中国大陆导入的建筑样式为基础，经过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而逐渐形成的日本本土化建筑样式的总称。和样具备独有的特征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构成了中世建筑发展的基础。

中世的和样建筑以兴福寺的重建拉开帷幕。其中第一个实例是 1210 年（承元 4 年）重建的北円堂（图 5），还有重建于 1415 年（应永 22 年）的东金堂，这一批奈良地区的中世建筑都传承了古代以来的建筑传统。再来看京都地区的情况，建于 1227 年（安贞元年）的大报恩寺本堂并没有积极地采用新样式，仍然保持着和样；重建于 1363 年（贞观 2 年）的六波罗蜜寺本堂也仅有几处细部采用了新样式。从这些实例可以发现，在中世，京都地区坚实的和样传统得到了绵延的传承。



图 5 兴福寺北円堂 1210 年(承元 4 年)

与传统的和样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大佛样。这是在大劝进重源的主导下，东大寺在镰仓时代重建时所采用的新样式。尽管重源引入了中国南宋建筑样式的一个流派，创造了日本建筑的新样式，但是纯粹的大佛样建筑也仅限于重源主导或者参与建设的东大寺镰仓重建建筑，以及在全国各地分设的七处别院建筑。这些实例中有东大寺开山堂那样的小规模佛堂，也有大规模的方形佛堂净土寺净土堂（建久 5 年即 1194 年建造）（图 6），以及平面为横长形状的醍醐寺经藏等，它们证明大佛样是一种不拘泥于规模和形式而具有一定自由度和适应度的建筑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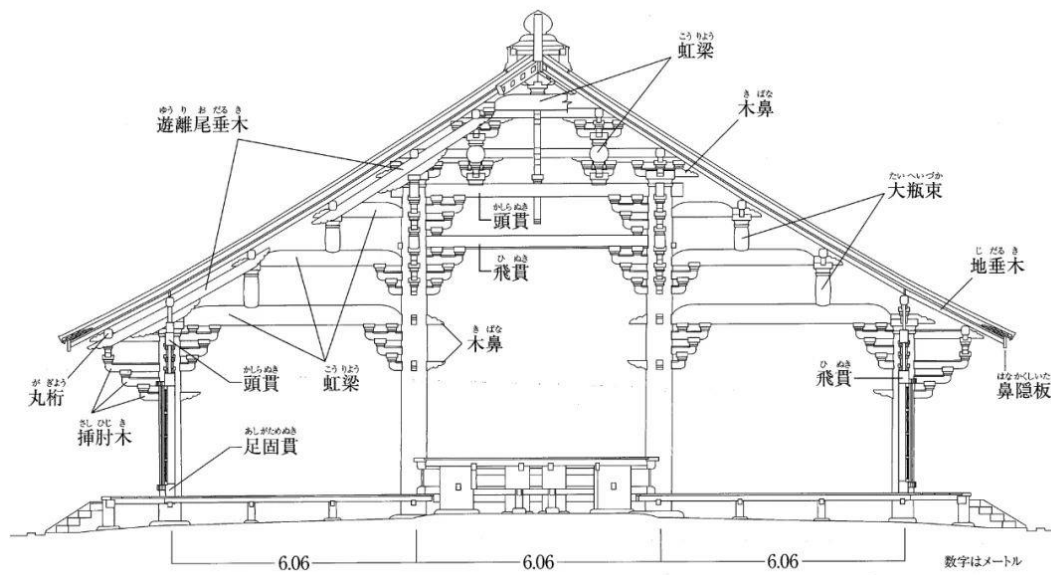


图 6 净土寺净土堂断面图 1194 年(建久 5 年)

大佛样虽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施工构造技法和设计意匠，但是它活跃的时期很短，也没有得到普及。同时期的传统和样建筑也达到了相当洗练的水平，仍然占据着寺院建筑的主流地位。也许正因为大佛样是崭新的建筑样式，才没有被惯用和样的工匠和技术者们彻底接受吧。

4 样式的发展：禅宗样与折衷样

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和中国宋朝贸易往来频繁，因之文化交流也日益兴盛，这种社会情况一直延续到中世，导致了正统的禅宗寺院在日本的勃兴。禅宗样从建仁 2 年（1202）建仁寺的创立开始传入，到建长 5 年（1253）以建长寺的创立作为标志，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对禅宗样建筑的研究不仅集中在样式方面，和古代建筑的研究一样，禅宗寺院的伽蓝布局也成为研究对象。早期的研究认为，禅宗样的形式在日本禅宗寺院格局定型的时期得以确立，也就是 13 世纪。然而，这个时期对样式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现存的禅宗样佛堂都是 14 世纪以后的遗物，在样式上与伴随禅宗寺院同时导入的南宋建筑样式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并且它们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在年代上也没有断绝，这是与大佛样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东京的正福寺地藏堂和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几乎采用了相同的规模和形式，据此可以看出普及于全国各地的禅宗样建筑在样式上所具有的统一性。

禅宗样在镰仓时代的发展情况尚不明确，典型的禅宗样建筑发展成型的时期是在室町中期。禅宗样的完成度越高，其形式和样式特征就越典型化。同一时期与禅宗样在并存的还有一种样式叫折衷样，具体来说，折衷样是在和样里加入一些禅宗样的要素，或者以和样为基础，混杂一些具有大佛样或者禅宗样样式特征的做法。

在镰仓时代后期，建于 1299 年（正安元年）的鑿阿寺本堂采用了禅宗样样式（图 7）。虽然经历了室町中期的大改修，从梁柱结构到木屋架的各部分仍然基本保持了禅宗样的特征，可以说是镰仓时代唯一的并且是先驱性的禅宗样实例。室町时代的折衷样建筑实例有建于 1397 年（应永 4 年）的鹤林寺本堂。它以混杂了大佛样的和样为基础，积极地融合了一部分禅宗样的形式特征（图 8）。



图7 鑿阿寺本堂 1299年(正安元年)



图8 鹤林寺本堂 1397年(应永4年)

5 结构与技术

日本木构建筑以梁柱结构为根本，梁和柱本身是结构构件。从法隆寺建筑可以得知古代建筑主要通过使用大截面构件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然而古代以后，各时代的建筑构件截面逐渐

变小，为了确保结构强度和稳定性而发展出相应的技术措施，也就是使用斜撑和穿枋（“贯”，额串类构件）进行结构加固。

使用斜撑的壁面构造做法估计在平安时代后期曾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做法在后世并没有普及。最大的理由可能是因为穿枋（“贯”）变成强化梁架的主力并得到了广泛应用。镰仓时代以后，斜撑不再用在墙壁里，而用在屋面草架结构（小屋组）里，但是近世以后屋面草架结构中的斜撑做法也消失了。穿枋（“贯”）属于结构补强构件，它们贯穿在柱及短柱之间进行拉结，以增加整个柱额部的水平刚性。根据使用位置不同，额串类构件（“贯”）的名称各异，有阑额（头贯）、由额（飞贯）、楣材（内法贯）、腰串（腰贯）、地串（足固贯）、草架穿枋（小屋贯）等，但基本的结构性能是一样的。穿枋在镰仓时代伴随着大佛样和禅宗样传入，在那之后得到了广泛普及。在奈良地区，1240年（仁治元年）建造的唐招提寺鼓楼（图9）是引进大佛样穿枋技术的早期实例，1279年（弘安2年）建造的长弓寺本堂（图10）表明穿枋技术的普及得到了推进。在京都地区，据东寺保存的《东宝记》，1343年（康永2年）寺中修理灌顶院时曾有如下记录：“恐未来颠倒番匠等柱横贯木入之”，说明在14世纪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穿枋作为结构构件的重要性。



图9 唐招提寺鼓楼 1240年(仁治元年)



图 10 长弓寺本堂 1279 年(弘安 2 年)

古代以来的和样发展到镰仓中期，细部上吸收了一部分大佛样的做法，结构上也开始使用穿枋对柱额部进行补强，这种受到大佛样影响的和样被称作新和样。在这一背景下，几乎同一时期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了具有独创性的佛堂。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出，这些佛堂在这种结构和技术发展、样式变迁的过程中，因为主持工程的工匠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今后则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中世建筑的发展变迁过程，尤其是技术、设计意匠等方面。

6 结语

日本的中世建筑界，以和样为主流，在意匠方面和技术方面导入了大佛样和禅宗样，建筑样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建筑样式的多样化以及复合化反而促使各种样式明确了自身的特质。对和样、大佛样、禅宗样等样式的区分，以及对住宅和佛堂的类型区分使得样式和形式被体系化、特性化。大约在室町中期的 14 世纪末即 1400 年左右，建筑样式的体系化和特性化基本完成。

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的建筑实例是京都鹿苑寺金阁(图 11)。鹿苑寺拥有诸多的殿阁佛舍，其中的金阁是舍利殿，建成于 1398 年(应永 5 年)。它的一层是寝殿造风格的住宅法水院，二层是和样风格的佛堂观音殿，三层是禅宗样风格的佛舍利殿，这三部分十分完美地调和在一起，各部分的比例也非常洗练、优美。金阁为什么各层采用了不同的样式，其理由不得而知，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设计者或者说是工匠非常精通各类形式和样式，并且对各种样式有着明确的认识。



图 11 鹿苑寺金阁 1398 年始建(应永 5 年), 1950 年重建

日本中世的寺院建筑, 在 14 世纪末期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建筑样式, 在意匠上和技术上也十分成熟, 达到了高度洗练的境地。比如, 建于 1407 年(应永 14 年) 东京地区的正福寺地藏堂, 以及建于 1415 年(应永 12 年) 山梨县的清白寺佛殿(图 12), 二者的建筑形式和样式与前述圆觉寺舍利殿完全相同。总而言之, 日本中世建筑经历了镰仓时代各种样式交错的混沌时期之后, 在室町时代发展到能够巧妙地运用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及样式的阶段,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样式的体系化。当然, 建筑个体之间由于工匠流派和体系的不同而具有这样那样的差别, 就建筑的整体建设问题而言, 今后还需要针对各类形式和技法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图 12 清白寺佛殿 1415 年(应永 22 年)

将南宋的禅宗引入日本的荣西和尚，在重源之后继任东大寺的大劝进一职，之后创建了京都的建仁寺，镰仓的寿福寺。荣西在 1207 年（承元元年）左右主持建造的东大寺钟楼是一座独特的建筑，它的构架部分使用了虹梁和穿枋（大量加入额串类构件），基本表现为大佛样风格，但是使用补间斗栱等细部做法又具有禅宗样的特征。同寺的南大门（图 13）和开山堂，在意匠和造型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差异。这几处建筑都以南宋建筑样式为基础，自然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差异，说明建筑样式尚未定型。此外在京都，有渡宋归来的僧人円尔开山创立的东福寺，以及同是入宋归来的律宗僧人俊仍营建的泉涌寺等寺院，诸宗兼修的大伽蓝也被建造起来。这些建筑实例虽然也受到来自南宋的影响，但若按照定型以后的标准来审视它们的完成度的话，其建筑样式尚属过渡阶段。再比如东福寺三门，尽管是正宗禅宗寺院的禅宗样建筑，在细部上仍然采用了与东大寺南大门类似的大佛样做法（图 14）。



图 13 东大寺南大门 1199 年(正治元年)



图 14 东福寺三门约 1405 年(应永 12 年左右)

毫无疑问，正是与中国建筑的密切交流促成了日本中世建筑界的发展。大佛样和禅宗样的起源都在南宋，它们与南宋建筑之间的类似性也显而易见（图 15~图 18）。不过，传入日本的建筑样式与来自中国的原型绝非完全相同，而是各自有意匠和技法上的特点以及深化的方向，今后需要对这些差异加以关注，从而考察建筑文化交流的过程。



图 15 延福寺大殿外观 1317 年，中国浙江



图 16 延福寺大殿内部 1317 年，中国浙江



图 17 圆觉寺舍利殿外观 14 世纪初期，日本镰仓



图 18 圆觉寺舍利殿内部 14 世纪初期，日本镰仓

建筑史学刊
佛教建筑